

威廉·李卜克內西著

不要任何妥協！

姜其煌、張興、毛韻澤譯

不要任何妥協， 不要任何選舉協議！

威廉·李卜克內西著

姜其煌、張輿、毛韻澤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ильгельм Либкнехт
НИКАКИХ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8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局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不要任何妥协，
不要任何选举协议！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著

姜其煌、张兴、毛韵泽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延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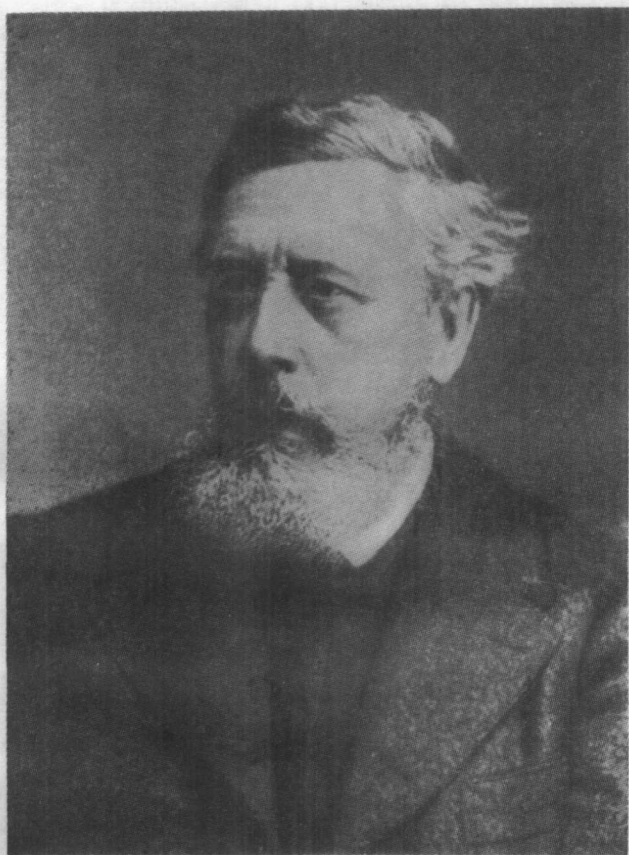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 \frac{1}{4}$ · 插页 1 · 字数 77,000

1964 年 8 月第 1 版

196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14 定价（六）0.38 元

印数 00,001—10,000



СМН 03/07

出版者說明

威廉·李卜克內西（1826—1900年）是德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他积极参加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革命失敗后，先后侨居瑞士和倫敦。在倫敦，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社会主义者。

李卜克內西曾加入倍倍尔組織的薩克逊工人协会，并和倍倍尔一起領導了反对拉薩尔派的斗争。1869年，他和倍倍尔主持了爱森納赫工人組織代表大会，会上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他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員。

1867—1878年間，李卜克內西先后当选为北德国會議員和全德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議員。他善于利用議會讲坛揭露普魯士容克的反动政策，以战斗性的热情洋溢的演說进行革命鼓动。他坚持党在国会中的策略、立場，对敌人决不作原则性妥协。

李卜克內西在革命活动中也犯有严重錯誤。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他为了达到德国无产阶级的統一，热情地促成了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的联合。但是，他在革命理論根本原則問題上向拉薩尔派作了让步，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評。此后，他在俾斯麦实施反社会主义特別法初期和在担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編輯时，都曾犯过錯誤。不过，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的影响下，他在斗争的关键时机終能采取革命立場。

李卜克內西的著述很多，其中特别是他的关于闡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基础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現在譯出的本书的前

两篇，就是属于这类著作的一部分。

本书第一篇“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場”，是李卜克内西于1869年5月31日在柏林工人联盟會議上的演說。

李卜克内西在演說中，論述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揭露了资产阶級民主的虛伪实质，明确指出“在軍事警察和大兵的刺刀所統治的情况下”，“普遍选举法只能是专制制度手中的玩物和工具”（本书第15頁）。因此他认为，俾斯麦頒布普遍选举法，“根本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民主的杠杆，而是为了使它成为反动派手中的武器”（本书第16頁）。

李卜克内西考虑到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強調指出，工人阶級除了社会斗争以外，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他对于俾斯麦和反动派所宣揚的“社会主义”的欺騙性，則給以彻底揭穿。

李卜克内西发表这篇演說时，德国的民族統一运动正在两条道路上进行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尽管在前两年北德联盟已經成立，德国已按照反动的俾斯麦政策有了重大轉变，而李卜克内西对于革命的远大前程依然满怀信心，他說：“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本书第21頁）。

本书第二篇“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協議！”，是李卜克内西在逝世前一年即1899年鉴于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当地中派組織訂立正式協議的危險活动而写的。

李卜克内西的这一著作，对于当时过高估价議會活动作用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抨击。列宁在1906年同孟什維克进行激烈斗争时，曾为李卜克内西这一著作的俄譯本写了序言^①，給了它以非常高的评价。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86—392頁。

李卜克內西从党的策略基础建立于階級斗争这一根本原則出发，強調指出，階級斗争是党生存的条件。任何用訂立協定、选举協議、妥协等等的所謂“现实”政策来代替党的階級斗争政策的企图，都是錯誤的。他說：“我們仍然站在階級斗争的立場上，还是放棄使我們不同于所有資產階級政党的階級斗争观点，……关系到我們是否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党，还是我們轉为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左翼”（本书第 59 頁）。

李卜克內西在議會活动中所采取的不調和立場，并不排斥原則上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協議，問題在于在什么情况下允許訂立協議和訂立怎樣的協議。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須严肃认真地考虑到达成協議和妥协的暂时利益有否損害工人階級政党的长远利益。并警誡人們，必須認識訂立協議的“同盟者”是怎样的人，是不是隱蔽的敌人？他认为，公开的敌人是容易被打倒的，“但是对那些自称是我們的朋友和兄弟，向我們伸出手来訂立选举協議和騙取我們信任的敌人”（本书第 58 頁），才是特別危險的。

李卜克內西极力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階級的道路，决不向反动統治制度、容克俾斯麦政策作任何让步，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充分貫徹在他的著作中。他說：“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原則当做交易品”，“我們应当推翻統治制度，同它进行殊死战”（本书第 74 頁）。

本书第三篇“蜘蛛和蒼蠅”，是一篇深入淺出的通俗讀物，作者以生动的文笔，寓意深长的比喻，尖銳地刻划了罪恶的資本主义剝削制度，对于傳播革命思想激励斗争意志有很大作用。

李卜克內西的著作也还是有缺陷的，他在本书中对于拉薩尔的評價是不正确的，而且他不止一次地把拉薩尔的名字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同称为“偉大的导师”，也是錯誤的。在书中的个别地方，如說“社会民主党……所力求取得并为之而奋斗

的政权，其目的不是获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消灭资产阶级专政”（本书第 53 頁）这样的論点，是不够正确的。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国家政权問題，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阶级专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64 年 5 月

統一書號：3002-114

定 价： 0.38 元

目 录

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 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場	1
1889年倫敦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5
悲喜剧式的結尾	24
跋	31
不要任何妥协, 不要任何选举協議!	33
蜘蛛和蒼蠅	83
注釋	88

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 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場

1889 年倫敦版序言

我現在出版的这篇演說，沒有作任何修改，某些无可救药的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引用我这篇演說，以证明現在的我已不是十年前的我了。我乐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过錯，而且要补充一句，我确实是个“識时势”的人，因为我总使自己的行为适应于变化着的情势。我甚至有这样一种荒唐观点，认为一个人不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其行动方式，是并不怎么聪明的。在业已改变的情势中不改变策略，这并不证明性格的坚强，只证明智力的貧乏，并不证明始終如一，只证明无能为为力。在战斗过程中不能改变策略計劃的將軍，是不中用的；最輝煌的胜利，是由于在战斗时修改策略而取得的。

我今天的目的，同二十年、四十年甚至更多年以前一样，不过現在更明确一些并且范围广泛得多。我不止一次地改变过我的策略，非常可能我会再一次甚至多次改变我的策略。在活动范围和战斗基地改变的时候，我絕對会改变我的策略。

首先，我要指出我发表这篇演說的日期。它是在 1869 年，显然是在普法战争以前，德帝国建立以前。

那时的“北德联盟”¹ 具有某种暂时性的迹象，正如古怪的南德諸国一样。没有一个人（連俾斯麦² 也不例外）知道，这个“联

盟”是否是个早产儿、畸形儿、还是个正常的新产儿。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国外列强的恩赐，依靠了列强或多或少在道义上的支持，才实现了这一“爱国主义的”事业。我在1848年和1849年为了德国的自由和德国的统一，反对这一“民族的”怪物的创造者而进行过战斗，我一落到这些创造者的手里，他们就会二话不说把我干掉。我难道能丢棄自己过去的一切，贪图普选权这块油脂，而让自己落入扩大了普鲁士军事警察国家这个捕鼠籠中嗎？当然不能。如果条件不改变，我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会和我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一样。

但是，爆发了对法战争。靠俄法的恩赐而生存的北德联盟，改組成“德帝国”。

这就造成了完全新的形势。

德帝国决不符合“民族理想”。它既沒有实现“统一”，也沒有实现“自由”。这不过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德国，这是一个兵营的德国，周围还有一个大监狱。

然而，德帝国到底过着独立的生活，不依賴外国的恩赐，不能用一次打击，一次机械式的推动，就能从内部或者外部把它推翻。只有通过机体的内部发展，才能从周围还有一个大监狱的这大兵营中，产生出一个自由的国家。

簡短地说，这个残缺不全的德国(Rumpf-Deutschland)包含着一些因素，这些因素能够逐渐长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统一的德国，会在某个时候在欧洲合众国和全世界占据一个应有的席位，会使人忘記今天我們祖国在文明世界諸国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

根据我的爱好和願望，我决不会到国会里去。每当“无政府主义”的吹牛大王們称我是个癖好国会制度的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笑出来。我本人和国会制度的关系很不好。我对演說和发表演說总有点蔑視，我生来絕不是为了进行国会活动的。国会活动完

全不适合我的天性。我发表演说永远是勉强的，并且只有在我的崇高职责号召我发表演说的时候才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国会活动的意义的估价，比我自己的估计更低。

然而，在目前条件下国会活动给我们党的这种巨大好处，只有瞎子才看得出来！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比在任何别国组织得更好，具有更大的力量，那末我们首先应当归功于我们的国会活动以及由它决定的、同它不可分割的参加选举斗争。

在我的同志们的一致同意下，我把参加选举斗争提到首位。普遍选举法的教育作用如此明显，我认为没有必要来解释它的意义。如果我们决定不采取参加选举的政策，那我们今天还会是一个小派别，而不会是一个党。在这个党的周围集中了我们全部政治生活，尽管所有的政党，包括政府在内，都对我们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我们参加选举和国会活动，主要是追求宣传的目的，这一点我的同志和我经常强调指出过，我没有必要作更详细的叙述。现在我们还是很少的少数，其他一切政党在国会中作为“反动力量”反对我们，反对任何重大的工人立法，反对任何实行社会改革的重大步骤。在此以前，事情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的国会活动将和从前一样服从于一个任务：影响群众，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现在，关于国会活动我再讲几句话，只讲两三句话。好的演说家通常总是坏的政治家。演说家常常使自己和听众陶醉。演说家的成功和演员的成功有共同的地方，它发展虚荣心，产生几乎永远是可笑的、往往也是危险的夸大狂。

当然，不能完全拒绝代表机关的原则，但是应该对它作最必要的限制，也就是要竭力使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不是由国会而是由委员会来进行。每一个熟悉国会生活的人都知道，国会中的辩论很像剧院的演出，不像对现存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现在，国会的主要工作必须在委员会中进行。

人民为了一定的目的而选举出来的一些委员会，只是为了討論同它們都有關的問題才能集合在一起；這些委員會在法律生效以前，提出全部法律草案給人民表決，使人民不僅有權否決提供給他們的法律，而且有立法倡議權；同時也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會的自由，而這一切都存在於一個沒有任何力量來反對人民的政府之下。我大概想像的將來的（那時某種政權形式一般還將保持）立法和政權形式就是如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有很大一部分現在已經是簡單的管理機關，而當資產階級（它以鎮壓勞動民眾的政權授於國家或政府）的階級統治一旦被摧毀的時候，政府會成為純粹的管理機關。

但這暫時還是“未來的音樂”。幾年以前我在柏林的一次講演中，為現在擬定了這樣一個自己的國會（确切些說是非國會）綱領：

盡量限制演說部分；只在黨的利益需要時才發表演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利益，如果事情不涉及施行有利於工人的法令，沒有必要痛斥敵人，全面評述統治制度，換句話說，如果發言沒有完成宣傳任務的目的，那末，保持沉默勝過任何演說；饒舌和空談會摧毀黨的事業，因為它們能夠使黨喪失行動的意志。

在全體會議以外，在委員會里（如果我們又能參加進去的話），國會活動同樣應作最必要的限制。但只不過是限制。放棄使我們能參加委員會討論的武器，正像使自己不參加全體會議的立法工作一樣是很愚蠢的。我們的選舉人，完全有權要求我們在國會中盡一切努力，來改善勞動群眾的狀況和社會民主黨的業績。我們一味否定和抗議的策略，會成為疏遠我們朋友，摧毀我們腳下基地的必然手段。在這裡，正像在一切實際政策中一樣，我們應該遵循簡單的功利觀點，當然，是在不破壞原則的情況下。

李卜克內西

1888年11月15日福爾斯佗甫

第二版序言

不久以前，在开审莱比錫“譴責叛国案”³的陪审法庭上，我不得不就下面的报告作了讲话，这个讲话使我現在可以不再作进一步的說明。对于上述讲话，我只能作很少的补充。我三年以前所做的报告，是一篇“即兴演说”，因而也正要作为这样的演说來估計。对我当时所說的某些話，我既沒有理由收回，也沒有理由減輕。我最沒有理由減輕的，是我对俾斯麦国会制度的某些批評。这个国会制度在“德国国会”中所作的“光荣”表现，不亚于它在“北德国会”仙逝时的情况。

但是，我对这一特殊的累贅物的尖銳品評，当然應該扩大到一般国会制度。因为国会制度誠然無論在什么地方（包括波拿巴的Bas-Empire^①在內），都沒有像在普魯士德国扮演这样可怜的角色，可是在一切有国会的国家里，它总是为欺騙和奴役人民服务，無論在什么地方它不过是用詞藻的金綫織成的一件戏装，专制制度和階級統治在这件戏装后面隱藏着它們的丑恶本质和謀杀工具。在人民管理的地方，在瑞士和美国（它們当然还不是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那种典范共和国），就沒有任何国会制度。我們所追求的直接人民立法和管理，誠然不能完全沒有代表机关。但是，通过自由的人民选举推派出来的公民，会組成委员会，实事求是地完成規定的、严格限制的任务，而不会組成清談俱乐部，在那里談話多，能力弱，簡直不可能認真考察問題，严肃进行討論，通过勇敢的成熟的決議。不是法国的議會，而是它的委员会完成了英勇革命的巨大工作，清除了封建世界的骯髒馬廐⁴。就連我国的国会制度，

① 最后帝国(法文)，人們这样称呼衰亡时的羅馬帝国。在19世紀的文献中，这一术语用来代表法国第二帝国。

也看到自己必須把真正的实际工作交給委员会去办。

但是关于这一点，下一次再作更詳細的叙述。

我在报告中还提到了施韦澤的活动和普魯士王国宫廷社会主义之間的不同，这在当时的党派关系中是有其根据的。我和倍倍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⁵ 巴門—爱北斐特全会(1869年3月)上的演说，表明我們同封·施韦澤先生⁶ 訂立了类似停战协定的东西，这在当时还有效，但很快停战状态就中止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順便說一下，不管封·施韦澤先生过去对这个联合会产生过多大影响，——遺憾的是，今天他还以間接办法对它保持着这种影响——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联合会同目前幸福地获得宫廷詩人称号的封·施韦澤先生等量齐观）当时的政治立場，最后在我的报告中完全正确地把它称为“民族自由主义的”立場。

我这样大力強調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間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是施韦澤的策略迫使我这样做的，这个策略要使工人不相信民主。至于对“市民民主党”（我保卫它，反对宫廷社会主义的卑鄙攻击）所作的各种不正确解釋，則随着雅科比⁷ 的加入社会民主工党而失去了任何基础，因为我指的正是雅科比及其同志。

在这些說明以后，下面就是我的报告，它是根据1869年夏載于“民主周刊”⁸ 上的原文（不是速記记录）翻印的。該报告以后出了单行本。

威·李卜克内西

这次我没有听到国会里的言論，所以我更高兴利用这个机会談談我的社会政治观点。

对于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問題，如果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間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話，就可以容易而自信地予以回答。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但它們不过是一个基本思想的不同表現，它們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从来不可能互相矛盾。沒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沒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虛假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社会主义原則組成的社会的唯一可能形式。

所有反对资产阶级的人，都同意社会主义的否定方面。瓦格納⁹、凱特莱尔主教¹⁰、奥国国会的天主教教皇和普魯士典范国家的新教地主，他們都像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使用同样的口号，高声譴責资产阶级。这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身，不仅不是人民的民主斗争，而且能够受到最反动的动机的束縛。所以，除社会主义的否定方面以外，必須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的肯定方面，使我們同这些反动分子区别开来。首先我們要說：除社会斗争以外，我們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应该把这个斗争放在最前列。正因为我們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間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們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这个名称，包含着我們的綱領。綱領的存在，不是为了在字面上承认它，而在事实上否定它。綱領应该成为我們行动的指导綫索。

如果我们只局限于社会斗争，而不給政治斗争以相应的地位，